

怀念吴征镒先生

朱为庆

(1934~)，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吴征镒先生是我学习前辈的榜样。从初中到大学我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1949年以前我只断续享受过一年的初中教育。那时候我们年青人自我要求的目标是又红又专。当时我们心目中红的标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做到一切服从党的需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忘我工作。专的标准是：努力学文化、学知识、学科学技术，使自己能为人民服务本领，鼓足干劲，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初到植物研究所时，我们这些被分配到植物研究所的大学生都在图书馆劳动，把前辈们从外国买来的一捆捆很厚的尘封过期刊抽印本，进行除尘、开包、清理，并予大概地分类，此时接触到很多英文和俄文以外文种的文献。从这些文献中见到有不少与众不同的古植物学文献，它所展示的图版大都是断枝残叶，看惯了现代植物标本的图版，突然见到这些断枝残叶的研究文章，对这样的标本的研究结果心中存疑：其有多少科学性？在学生年代采集现代植物标本时，老师都要求同学力求把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采集齐全，因为鉴定植物标本时，生殖器官的性状特别重要。如果采集时采不到生殖器官只有营养器官，那么营养器官最好也要具有顶端未成年叶的营养枝。所以见到古植物学文献图版中的照片尽是断枝残叶后，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研究这玩艺儿既枯燥又缺乏科学性，太没劲了！植物研究所现存这么多的现代植物都研究不过来，还研究这些断枝残叶，有多少应用价值啊？不过换个位置一想，既然前辈们辛辛苦苦地为后人从国外这么多种杂志中搜寻了如此多的抽印本，花了这么大的本钱用外币把它们买来，必有它的重要价值所在；也许是哪位老先生对这方面感兴趣，以后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先为他们准备好资料罢了。反正此事与己无关，也不必多想。在等待分配工作过程中，根据研究所领导向我们介绍的科室设置后，我有时在想：如能从事药用植物或生态地植物方面的研究很不错；形态解剖方面也还可以。因为少年时在农村亲历了中草药在农村治病中的重要作用，后来在生物系学习植物分类学时，陈倬先生讲授了植物分类学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意义，使我们对分类学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学习生态学时跟随周光裕先生在野外实习，周先生常给我们讲些野外生活的趣事，使我对生态工作也颇感兴趣，不过从事生态工作必须有分类学基础；系主任陈机教授生动的植物解剖学讲授，周才武老师讲授人体解剖学时对尸体的解剖学习，使我对解剖学兴趣颇浓。来到植物研究所见到有这么多的植物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室，有这么多的老先生和中、青年人员的研究阵容，有这么蔼然可亲的领导队伍，这样的工作环境和学习条件，让我兴奋得像似进入了科学的天堂，真是连做梦都想不到。当时植物所的房子虽然大多是破旧的平房，但我根本不在乎。时任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党总支书记姜纪五每天夹着公文包像家长似的进了植物研究所的大门后，都要先到各研究室巡视一遍，不论哪个阶层有人向他反映情况，他总是细心听取。办公室主任杨森同志和人事科科长赵星武同志经常关心地问我：“你们怎么样啊？！”（因为我是当时新分配来的大学生的召集人，所以接触较多，体会也更深刻。）我们这些同届进所的人，彼此亲密得如兄弟姐妹，整个植物研究所真像一个名副其实的温暖的大家庭，使



我大开眼界，心情特好。但十分遗憾的是：姜老的优良领导风格，杨森同志爱所如家的敬业精神，后继乏人。

植物研究所领导对新分配来工作的大学生宣布分配名单时：某某人到某研究室……朱为庆到古植物（因为研究室还没有）。刚听到叫我到这个最不了解、最不喜欢的部门工作的“命令”时，虽然我表面上是服从组织分配，但是内心完全是被动服从，还伴有恐惧感。因为别的新分配来的新生当时都能见到所隶属的主管老先生和中年先生，这些老先生的名字我在学生期间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耳熟，而带我的老先生徐仁教授，不但我过去从未见过，而且闻所未闻。别的新生都有具体研究室的房子实体，而我要去的古植物不仅现在见不到老先生而且连房子也没有，更甭说桌、椅、板凳。当时我虽然有一股为共产党、为新中国、为人民赤手空拳打天下的勇气，但是目前上面没有老先生具体指点，下面没有同伴协作，难免颇感孤单，并且还有点害怕，怕做不好工作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养活我们的人民，有畏难情绪。以前遇到困难或接受领导交给我某项即使是自己不熟悉或不喜欢的各项工作任务时，都会产生一股非常强有力的克服困难的热情、信心和勇气。不知怎么的，这次这种积极的精神和勇气无影无踪了。此前对吴先生过去在专业上勤奋苦学和投入大量时间从事业务组织管理工作有所听闻，这是我见到的离我最近的党员专家服从党组织调配的典范。那时他已经是植物研究所的副所长了，在植物所很有威望，但他从国家长远的需要出发，不仅个人服从党组织的调配，还举家离开人人向往的首都，迁往昆明去建立新的研究所。吴先生的榜样精神给了我热能，使我对接受不太了解的新工作增加了热情、信心和克服困难的勇气。

慈父般的姜纪五书记主动询问我：“怎么样呀？！”我带着有点为难的情绪，委婉恳求的语气向他诉述所思和看法：“这个古植物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化石标本以前只是在上《普通地质学》的课堂上见过一面，当时老师还慎重嘱咐：这块标本只许看不能用手摸啊！这是用美金从美国买来的！加上地质学是考查课，我当时思想上对它不大重视，对它的意义认识不足，学习目标只是达到考查通过就行，所以对古植物几乎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工作啊！”我向他诉述的目的是希望能听他回答我：换个人做这个工作。不料他风趣地说：“没有学过也没有关系，可以干中学，边学边干嘛！古植物研究室现在还没有，我们要建立。我们是先盖庙，后请神，请不到大神请小神。徐仁先生是大神，现在还在野外来不了，你算是一个小神，要先把庙建起来，没有庙，大神没座位，能请得来吗？”我拿谦虚做托词：“古植物我实在干不了，做不好，我做别的任何工作可能都会比做它做得好。”他看出我貌似谦虚，实际上是有点固执地不想干古植物的诉述，笑眯眯地，有点像哄小孩似地说：“那你先干三年，三年以后如果还不想干，我再给你换，这样可以了吗？”我带着有点勉强的口气：“那好吧。”

不管当时说话时的心态如何，答应人家了就要尽快调整好心态全力以赴。我把植物所坐落在动物园陆谟克堂最北面的一排平房中间清理出约50平方米的一大间，把最西边隔出三分之一的面积作为徐仁先生的办公室。为了让全所唯一的泥瓦工师傅尽快完成上一个任务，早点帮我把办公室砌墙、和灰、隔断，我帮他做小工，提早按我的要求完成了。国家在当时尽管不幸地遇上一年比一年困难，但是却让我增加了动力。随着对专业不断深入的了解，体会到以前学的植物系统学有点像生活史比较形态学，太缺乏古植物学的材料来佐证，古植物化石标本虽很破碎，研究方法比较贫乏，但是短短几年中学到了不少室内外的工作方法并有所革新（如保存山东山旺硅藻土中的植物化石标本，我摸索着利用废蜡封住植物化石层面边缘，缓慢干燥防碎试验获得成功等），并体会到：兴趣的基础是对事物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深度。我对古植物的认识从开始瞧不起不愿干，到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在几次面临有更高更多名、利的吸引面前，都能做到不动摇的坦然相对和婉言谢绝。我思想和行动的巨变不能说与我心目中的榜样吴先生无关。

1962年11月25日开始，我们全室出动去云南分组采集标本。从情感上讲，吴先生所在的昆明植物所成了我们各组进出昆明的家，每次碰到吴先生，他总是会关心地问我怎么样。1963年2月4日徐仁先生、朱家楠、陈晔和我，在宜良石油队金式刚和李书舜二位陪同下，去沾益采集泥盆纪化石。不料从10日开始一连下了4天霰，阔叶树叶外面包了一层厚厚的冰，成了难得一见的“第五纪化石”，我们冻得没法出去，只好在室内烤炭火取暖。沾益县医院原西南联大的学生韩大夫常来我们住处，与徐先生叙旧西南联大往事，开玩笑地说：“你们只知道我们这里四季无寒暑，却不知道下边还有一句，一雨便成冬，所以吃了亏。”那几天我们经常一面围着火炉煎着韩大夫给我们开的中药，一面聆听两位长辈给我们讲故事，韩大夫有时还给我们介绍一些当地常见病的中草药汤药处方。在昆明我们还了解到徐先生是吴先生入学清华大学的保证人。这次寒流徐先生也冻病了，在吴先生的关心照顾下，他人住了安宁温泉疗养院。吴先生的感恩之情令我钦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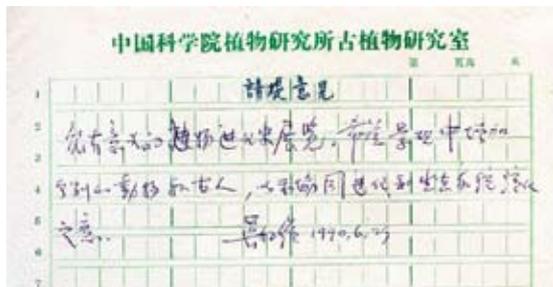
改革开放后，科学院成立研究生院，有一门基础课是《植物系统学》，64个学时。其中，低等植物16个学时，原想请北京大学梁家骥教授讲，梁先生说讲不了。徐先生叫我讲，由于当时讲课是要求正教授讲的，我说我现在连副教授都不是，更讲不了。徐先生说：“那你去请哪个教授来讲都可以，请不到就你讲。”我无奈只好答应。北京大学李正理教授要我给他的研究生大约每隔两年讲两个来小时的古植物学，并同我说讲课内容在期末闭卷考试时是有一道题的，占（百分制的）20分。我小时顽皮，父亲告诫我说：“不敬师长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所以为这两小时的课，我虽然几乎花了两周时间备课和找寻适当的标本，但是仍感时间不敷，加上挤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讲课，举着化石标本给同学看实物的效果总是很不理想。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促使我下决心从我承担的植物系统学部分开始做一个植物系统学的教学改革：我心目中的植物系统学应该是以时间为径，空间为纬，各个门类的化石植物为点缀，编织起来的实物教科书——植物演化展览。筹备基本就绪尚缺陈列场地时，党委副书记张强同志告诉我：“所里决定提你为研究员，到物资处去当处长，两头沉的办公桌（当时副研是一头沉）、沙发、茶几等都给你准备好了……”我说：“我不去。”他说：“党员要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啊。”我说：“我正准备对植物系统学做教学改革，建立一个植物演化展览室，讲故事似的教学。这不仅对我们科学院的研究生和其他学生的研究生、本科生，甚至于对中、小学生乃至社会各阶层都会从中受益。对提高我们的民族素养也都有好处。当物资处长只是对我们的所或院有好处……。”事后有人劝我：你先到物资处去工作三个月（有人说最多三五个月），到时你说干不了了，回来搞业务，这样既不得罪领



吴征镒院士听取中科院植物所植物演化展览创始人朱为庆的汇报



导，研究员又拿到手，两全其美。我说：“这样既对不起提名我的领导，还让他们难堪，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在有关领导支持、批准下，我终于把一个堆放废品、垃圾和又臭又黏的皮肥库改建成了教学改革的新课堂——植物演化展览室。落成后受到很多中外专家高度赞扬，其中吴征镒先生也曾前来参观并留言鼓励。



吴征镒院士听取汇报植物演化展览后题词

在吴先生和众多国内外专家的鼓励下，更坚定了我从中国古植物馆进而扩展到中国植物博物馆的希望，让国人从这里能分享到更多、更深层次的植物学知识。很少题词的周光召院长为“中国古植物馆”提了馆名后不久，1998年5月14日前国家文物局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吕济民教授率两位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偕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长及两位工作人员前来考察，我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古植物馆的机构筹备情况后，他们参观了中国古植物馆的储藏部（标本馆）、展示部（植物演化展览）、研究部（是古物研究室的部分研究人员兼职）。他们回去后不久，北京市文物局就下达了批准“中国古植物馆”成立的批文。新出版的北京市博物馆分布图上中国古植物馆成了当时香山地区三个博物馆之一。

1996年在美国举办的第五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上，中国植物学会古植物学分会和中国古植物学会古植物学分会先后向大会提交申办2000年的第六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在中国召开，被大会批准通过。中国植物学会古植物学分会组织稿件，经中国植物学会批准，《植物学通报》2000年7月第17卷为第六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专辑。另外我们还想赶在第六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之前出版《徐仁著作选集》在大会上交流。因此我借1999年10月25~29日中国植物学会古植物学分会在昆明召开“地质时期植物多样性”学术研讨会之际，诚邀吴老和周俊先生两位院士莅临研讨会指导之外，还请吴老为徐先生的“选集”作序。虽然吴先生此时正忙于出差日本的准备工作，但仍满足了我们的要



1999年10月25日，吴征镒院士莅临中国植物学会古植物学分会组织的“地质时期植物多样性学术研讨会”留影

求，我的内心既充满了感激又深感歉意。

1998年7月植物所新领导上台，先把中国古植物馆的展示部——植物演化展览撤销，改成饭馆，紧接着撤销中国古植物馆，其二楼改成办公室。原设想该馆二楼再充实一些内容后与植物演化展览一起，在2000年国际古植物学大会在我国召开时作为会前考察的内容之一，因为这个专业展览面积虽然不大，但是陈列内容纵向时间之长，专业人员讲解内容门类之多：从生命起源开始到生命出现；从原核单细胞到被子植物覆盖全球的全过程梗概；全是由高级古植物学家一年四季（除病、事假外）终年讲解，据当时的博物馆学家说：这是国际上未见的。中国古植物馆和它的展示部——植物演化展览室被撤销，不仅是丧失了第六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在我国召开时一个非常好的学术交流和对外宣传的机遇，还阻断了青海省地质局6000多号化石植物标本来我们古植物馆安家落户的路。可怜了这批经过多少野外考察者，花了多少代价搜集起来的植物化石的命运——最终成了孩子们玩耍时投掷的石子。

致谢：我女儿在为我寻找资料、多次帮我排除计算机故障和文稿编辑等方面花了不少时间，谨此致谢。

